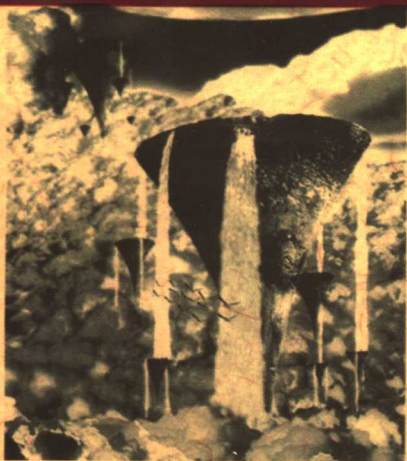




徐 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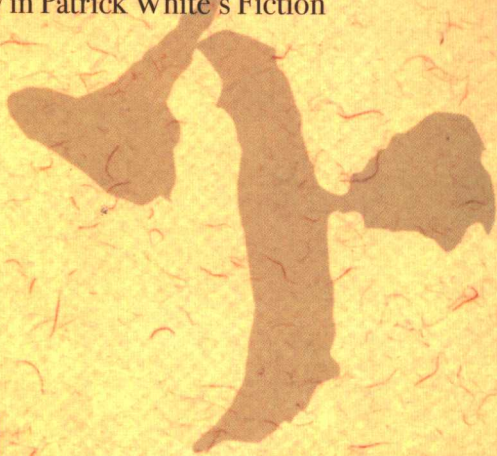
孤 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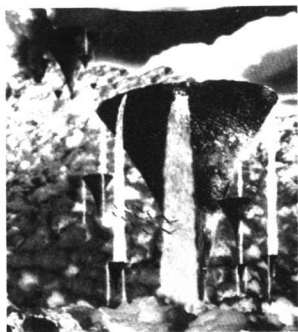
大陆上的陌生人：
帕特里克·怀特
小说中的
怪异性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trangers in a Solitary Land: Contextualizing
Eccentricity in Patrick White's Fiction

比
较
文
学
与
文
化
丛
书





徐 凯 著

孤 寂

大陆上的陌生人：

帕特里克·怀特

丛书主编 蒋承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怪异性研究 藏书章

Strangers in a Solitary Land: Contextualizing
Eccentricity in Patrick White's Fic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 徐凯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3

ISBN 978 - 7 - 80745 - 004 - 7

I. 孤... II. 徐... III. 怀特, P. (1912 ~ 1990)—小说—文学研究 IV. 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422 号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 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著 者：徐 凯

特约编辑：王清伟

责任编辑：汝 东

封面设计：王斯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5

插 页：2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004 - 7/I · 000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当今时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①。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

2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 21 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一体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

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类文化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现实的情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③。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命运是否有可拯救之法,笔者无力解答,也无意于去解答。但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这样做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

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都已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④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更强的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认同和互补,对推动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即比较文学与文化,是天然地连为一体的。也许,正是把比较文学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

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浪潮的生机;而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想法,我们编撰了这套“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我们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 21 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作点微薄的贡献。

2007 年春节

注释:

①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1 期。

②③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见《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④ [美] 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第 235 页。

序

黄源深

徐凯是一个温顺敦厚的小伙子，圆圆的脸上成天浮着笑容，有时会笑得眼睛挤成一条线，露出一副可爱的憨态。尽管惹急了他也会脸红脖子粗，但他的性格是不温不火的。这样的人，一般说来，你总以为他不大会个性，说话写文章很少会有棱角。但要是你这样去想徐凯的话，那就错了。生活中的徐凯很有主见，决不会人云亦云地随大流，做起文章来，也总是自出机杼，发人所未发。别人研究海明威都去探讨他作品中的硬汉子，而海明威确实也以塑造硬汉子形象而闻名，但徐凯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去论述海明威笔下的妇女形象，另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回撰写博士论文，徐凯又是别出心裁。怀特(Patrick White)是一个被人写了又写的话题，无论是国内外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还是攻读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生，都对怀特情有独钟，研究文章源源不断地涌来。尽管怀特是一座富矿，但禁不住那么经年累月地挖掘，显得有些开采过度，再要闯进去，似乎也很难掏出新的东西来了。但徐凯却自有办法，他避开了怀特作品中的那些热点，如超验主义的追索、反英雄人物的塑造、社会的极端排异、语言风格的奇谲、刻薄冷峻的讽刺等等，而另走偏门，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研究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eccentricity)”，又一次显示了他思维的独创精神。

2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怀特的小说中不乏怪异人物，这些人往往同家庭和社会格格不入，或为环境所迫，或是出于自愿，离群索居，生活在一个由性格同样怪异的人组成的小圈子里。虽然如此，他们并没有遗世独立，相反却关注人生，指点江山，批判污浊。他们始终保持着理智的清明，洞悉常人所见不到的社会弊端，精神上作着不倦的追求，很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他们不同于传统小说中那些由于挫折和失意而导致性格怪异的人物，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物质上，他们是离世的，精神上，他们却是入世的。他们都是些小人物，却并不妨碍通过自己微弱的声音，呼喊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积极追求。

怀特把这些怪异人物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载体，通过他们的折光来反映现代社会。选择他们，就像画家选择漫画，剧作家选择小丑，普通人选择哈哈镜，来反映各自的对象一样，使被反映的内容更加夸张，更加醒目，更具震撼力，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怀特笔下的这些独特的人物，是怀特所调动的一种成功的艺术手段，是以前所鲜见，今后又难以复制的手段，因为怀特就是怀特。

徐凯在读博期间不仅完成了这篇有创见、有分量的博士论文，而且还在《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六篇文章，成绩十分显著，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感到高兴，当然也祝愿他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2006年11月20日

于紫藤斋

摘 要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于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家。怀特长期以来一直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大多数澳洲读者的视野背景当中。作为时代的隐喻,“怀特”这一文化符码成就了或贬或誉不同的景观。怀特一直是中外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有关怀特研究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从主题、结构、象征、语言都有讨论。怀特的作品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实验场,新批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先后登台。方法殊异,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龃龉,势若水火。有论者强调怀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认为怀特属于欧洲文学传统,并且批评怀特的作品与澳洲毫无关联。有的论者则强调怀特的主体特性,认为怀特创作的内容和方式完全是由他个体的特立独行的脾性所决定的。另有论者则强调怀特作品与澳大利亚的关联,把他奉为国家神话的书写者,完成了国家的文学建构。

本文认为,怀特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的小说是当时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表述。刻骨铭心的异化和孤独感是20世纪的世纪病。但是,由于澳洲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地缘关系,这种失落、异化和孤独在澳洲尤为强烈。诚然,怀特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怪异人物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普遍的症候,怀特对现代意识的关注已经超出了澳大利亚的地理和文化疆界。然而,评论

2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界往往过分强调他的世界性，从而忽略了他那不容忽视的独特的个体性和民族关联。另一方面，有的论者虽然强调怀特作品的民族关联，但是过分强调作品在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政治功能，从而消解了作品的艺术成就。澳洲已有的怀特评论中对怀特作品的理解、批评、欣赏或攻击中，往往政治诉求大于文学诉求，道德意义大于美学意义。澳洲论者和读者对怀特的肯定或否定与其说是出于文学的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历史的理由；与其说是出于理性，倒不如说是出于情感。

怀特的作品就像一座巨大的富矿，有的地方被过度开采，有的地方被重复开采，有的则被有意无意地被遗忘或避开了。在怀特评论的众声喧哗中一个声音被掩盖了，一种精神状态被遮蔽了。那就是怀特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怪异性。几乎每一部怀特的作品都关注怪异人物，而且不是单个的怪异人物，往往是怪异族群。怀特将怪异问题化、中心化，怪异已经成为文本意义的诞生地。像他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本文以怪异性为切入点，运用福柯的疯癫理论，异质空间、荣格的创作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怪异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解读怀特作品中作为隐喻的怪异所承载的现代性意义，揭示遮蔽在怪异性之后的特殊的澳大利亚民族心理。论文通过对作者和文本的双重把握，既研究作家生平与作品内涵的深层关联，又着力从作品艺术形式的缝隙中去发现作家的精神印记，竭力在作者的“暴政”和论者的“霸权”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

论文从文本、作者以及文化语境等视角来解读怀特作品的世界性、独异性和民族性。首先是怀特作品中的怪异人物形象的世界性特征。论文分析了怀特小说中的疯癫、恶魔性、双性同体/同性恋、圣愚等怪异形象，强调怀特小说中若干怪异性的多元共生。澳洲特殊的历史文化特征使怀特的小说人物在与整个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怪异人物在精神领域相通相连的同时，又有着相对舒展的

形象空间,带着澳洲人特有的精神印记。

论文接着从创作发生学和创作美学的角度解码怀特小说中的多重怪异性符码。各种怪异性之间并非界线清晰,畛域分明,而是重叠渗透、纠结缠绕。论文试图说明,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看似色色不同,实则潜脉相通——都与创作主体的怪异性相通。怀特作为同性恋者在澳洲人的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异人物。他生于伦敦并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国外游历多年后回到澳大利亚。心理归属方面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徘徊。他的意识深层折射出多重的阴翳和二律背反的感情。在创作早期生涯中澳大利亚评论界的“恶评”也给他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理解怀特作为创作主体的怪异性是引导我们走出怀特所营造的代达勒斯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在澳大利亚构建统一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对同质性的关注形成了普遍的“仇异心理”(difference-phobia)。疯癫、圣愚、恶魔式人物、同性恋等怪异形象同属一个语义场,往往被指认为谈论禁区,甚至被完全排斥。社会文化地图上几乎未给怪异人物留下空间。本文认为,文学创作是怀特宣泄心理创伤的安全阀。通过创作,怀特宣泄了内心的苦闷,把驳杂的心灵状态转化为缤纷的艺术世界。对怪异人物的描述显然是作者那长期被压抑的自我一次次恣意释放,是对当时传统社会规范的公然挑衅。在怀特的小说世界里,被边缘化的个体走到了舞台的中央,似乎怪异才是人的正常状态。文学创作使怀特能够维持一个并不确定的自我。怀特呈现的是怪异人物的真实命运及其内在精神图像。怀特反对现代认知体系,通过对怪异的关注,来肢解当时的权力话语,将一个个怪异而又鲜活的人物从人们的视野的深处搀扶出来。怀特关注的是普通人的际遇,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他对精神贵族的高度认同,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启蒙和责任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法则。怀特写的是怪异的凡人,话语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这或许正是作家内心矛盾的一种外现。

4 孤寂大陆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

所以不难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女佣和农夫也有哲人般的真知灼见。这似乎不是一个恰切的叙述路径,但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怀特在叙述层面之后的叙事旨归。怀特笔下的怪异人物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心灵在别处。怀特和他的小说人物以不同于常人的坐标观照生活,日常行为的图谱后面是精神超验的广阔空间。

怀特的陌生化视角及其对怪异性的观照,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建构进行历史考索和追问。怪异人物形象之所以在怀特的小说中蔓延,是因为作者和作品需要它来刺激审美想象,需要它所负载的文化符码,需要它的隐喻意义。在怪异审美化的背后,掩盖着的正是通过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式的工作才能发现的社会和文化症状。

论文认为,怪异人物族群在怀特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折射出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体感受,更深层次上暴露当时澳大利亚普遍的认同危机。怀特小说中性格迥异、各有倾向的精神标本是被精心选取的。怪异人物所经历的分裂(肉体的和精神的)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分裂和人的异化,更重要的是指后殖民语境中个体认同危机和归属的阙如。

国家的命运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卑微个体来承担的。怀特笔下怪异人物的个人遭际具有民族寓言的功能。怪异性是主体不确定性的表征,是隐匿不彰的民族心理的外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澳大利亚文学透露出一种有关身份和归属的恒久焦虑。怀特这个同性恋者,一个从英国回到澳洲的“家中的放逐者”(exile at home),对自己的个体身份和归属,对民族身份的思考比其他的作家更加深刻。但是,怀特不是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构建个体身份和民族认同,而是用个体身份的追索来反映民族认同危机之下的普遍焦灼。他触及的是民族心理中隐秘的部分,是“集体无意识”,更接近民族心理真实。

从主体性的角度上说,澳大利亚现代文学的创生过程,也是现代主体建构的过程。以劳森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学中关注的多是民族国家的整体身份,着眼于“国家身份”的建构,而怀特则更注重于个体主体性的思考、发现和建构,着眼于“人的身份”的建构。如果说劳森写的是澳洲人的理想,表现的是理想的自我,怀特则写出了澳洲人的焦虑,表现的是隐秘的自我。怀特小说文本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后殖民的语境之下,“自我”的范畴是极不稳定的,个体的身份在国家身份的不确定状态下失却了归属,处于漂浮的状态,成为宗主国在其异质空间的“他者”。

怀特的小说印记了怪异人物灵魂移植的排异与适应,记录了文化他者身处边缘的纷繁复杂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淹没了。这些怪异人物体现的是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想象中未能涵盖的民族共相。怀特将怪异审美化,祛除了怪异的贬损涵义,还原了怪异族群生命形态的历史性与本真性。在怀特的小说中,怪异不仅是生存的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超验的必须。怀特试图揭示当代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结构和心理图式,并力图寻找平凡背后的诗意和超越。怀特消解了传统文学所构建的民族身份却更逼近了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讲,怀特勾勒出了“澳大利亚的精神版图”。

关键词: 帕特里克·怀特、怪异性、疯癫、圣愚、双性化、含混、身份危机、民族寓言

Acknowledgements

Although this dissertation, like many others, is written in solitude, and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relationships, it is the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s I have had that have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the completion of my dissertation.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my indebtedness, first and foremost,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Huang Yuanshen, who helped me in ways that the rhetoric of an acknowledgement could hardly register. His learning and good taste rescued me from a multitude of intellectual pitfalls. His guidance is a valuable gift with which I cannot part even in my future study. His scholarly instructions helped me, an otherwise stranger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to find my way in the now solitary land of 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I am also grateful to Professor Fei Chunfang, Professor Liu Naiyin, and Professor Zhang Hong,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ho have offered valuable advice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in the course of my writing.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Professor Vin D'Cruz at Monash University, Professor John Barnes, Professor David Tacey, Professor Chris Palmer, and Doctor Robyn

Walton, at La Trobe University, Professor Innes Tyson, a visiting scholar at Suzhou University, whose advice, assistance, encouragement, and critical acumen are also instrumental to the 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Special thanks should also be given to the Australia-China Council for a grant which assists me for a short period of research at La Trobe University. I wish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Professor John Fitzgerald at Asian Studies Center, La Trobe University, for his timely invitation and friendly reception.

I wish also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Professor Wang Guanglin for his intellectual availability, to Professor Peng Qinglong and Doctor Zhou Xiaojin for the stimulating exchanges of ideas between us, to Professor Wu Baokang for his generous share of his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with me, and to Professor Chen Hong, for his unstinting support.

I should like to thank the editors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and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or their kind acceptance of three sec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Finally, I extend my gratitude to my wife Wang Hui, who helped me to grapple with early forays into the subject, to shape and reshape the entire text. When I faced a blank computer screen that grinned back at me like a Cheshire Cat, her love and support helped me out of the crushing frustration. I also owe a debt to my little son, who is my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consolation.

These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are instrumental in the